探寻中国兵法制胜之道⑧

弥足珍贵的中国兵法智慧

■郝敬东

引言 中国兵法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先贤对军事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和理论集成。它是经无数能工巧匠之手建造起来的一座耀眼“宝殿”，形成了丰富、完备而深刻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古人积累的兵法知识、经验和智慧，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传承价值。今天，认真回顾和梳理中国兵法的精髓要义，从这份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中汲取精华，挖掘其中带有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展现了富有哲理的战争观念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的总体看法和根本态度。中国古代兵家对战争目的、性质、制胜规律等不乏真知灼见，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对于今天认识和处理重大现实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辩证看待。中国兵法首先回答了如何看待战争这一问题。一方面，慎战。战争事关国家命运，不能不认真对待。《孙子兵法》第一句话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就是慎战。另一方面，备战。《孙膑兵法》说“用兵无备者伤”，没有准备，就会受到伤害。军队要常备不懈，犹如佩剑，“旦暮服之”，不可须臾离开。这就是《司马法》首篇所强调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既反对轻战，不能无限制地进行；又反对忘战，不可麻痹大意，辩证分析了慎战与备战的关系。同时，古代兵家对战争性质已有区分，反对“无义”，支持“有义”，“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孙膑兵法》就指出“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正义的战争，兵少但战斗力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非正义的战争，谁也无法使其防守坚固。

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兵家较早就认识到战争是双方全部条件的综合较量，注重全面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如《尉缭子》说“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管子》讲“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孙子兵法》说“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反映了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对战争胜负的制约。同时，中国兵法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孙子兵法》说“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孙膑兵法》讲“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在对比双方条件的基础上，分析战争形势，探索战争规律。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总之，中国兵法十分重视对战争指导的研究，闪烁着朴素唯物和理性思辨的思想光辉。

沉淀了丰厚有益的国防滋养

中国兵法历经数千年，立足于居安与思危相统一、富国与强兵相统一，形成了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防建设思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风雨沧桑和智慧力量，具有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安不忘战。有国则有防，国防的存在和国家的产生一样古老。中国兵法早就有重视国防的思想。如《吴子》说“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百战奇法》讲“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虎钤经》说“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将苑》更形象地指出“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如果居安而不思危，敌人来犯而不知担忧，这就像燕子在帐篷上筑巢，鱼儿在鼎锅里游泳，灭亡的命运就不远了，都反映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天，在实力政治、丛林法则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中国古代兵家留下来的这些深刻教诲仍值得深思。

富国强兵。中国古代兵家早就认识到“犁与剑”这一古老命题，“犁”象征经济建设，“剑”象征军事发展，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地位不言而喻。如《孙膑兵法》明确提出“富国”是“强兵之急”，《管子》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草庐经略》讲“以屯田为长策。庶几可以息百姓之肩，军无枵腹之忧也”，都强调在重农的基础上富国，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兵。这一传统历经数千年，是一以贯之的国防建设思想，也是努力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未来战争不仅是“剑”的比拼，更是“犁剑合一”的较量，“犁”与“剑”越来越趋向“剑中有犁”“犁中有剑”，富国强兵仍是一条愈走愈宽的道路，萌发着蓬勃生机。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谋略智慧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谋略的较量。中国兵法延续几千年，蕴含着奥妙无穷的斗争智慧和神奇计谋，形成了带有东方特色的思维能力、博弈策略和无穷魅力。

兵贵定谋。中国古代兵家很早就认识到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如《虎钤经》说“用兵之法，先谋为本”“先务其本，本壮则末亦从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谋以御敌，虽有百万之众，可不劳而克矣”，《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讲“兵不法谋，不足以成其强”，都强调谋略是养兵用兵的根本。《淮南子》也指出“力敌则智者胜愚，势侔则有数者禽无数”“胜定而后战，钤县而后动”，强调如果双方兵力一样，聪明的就会战胜愚昧的，有计谋的就会战胜无计谋的；先操胜算而后战，权衡利弊而行动。今天，要注重汲取历代谋略思想，以“谋略+”推进战争筹划指导，谋划在先、谋高一筹，牢牢掌握未来战争主动权。

见情而谋。如何制定谋略？《鬼谷子》讲“见情而谋，则事无不济”，《六韬》说“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要根据形势制定谋略，做到周全、保密，巧妙引诱敌人，使其内部发生争斗，就没有不成功的。《兵法百言》也讲“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书而生，因天时地利事物而生，对法而生，反勘而生”，要依据敌情、我情、经验、兵书、天时、地利等反复斟酌，制定谋略，强调“善为事极，谋附于善为谋极”，要把谋略做到极致，还说“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必须群策群力。虽然这些思想和论述属于过去，但是，其中若干饱含智慧的闪光也同样属于现在和未来。

体现了深刻高妙的作战指导

中国古代兵家在长期军事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作战思想和指挥方法，蕴含着高明的制胜之道、用兵之法，对于丰富发展军事斗争指挥艺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战思想。中国兵法所揭示的作战指导规律，认识之深刻，艺术之高妙，至今仍令人叹服。如“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后发制人与“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的先发制人，“蓄盈待竭，避其锋势”的防御持久与“用兵上神，战贵其速”的进攻速胜；又如“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力争主动、“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出敌不意、“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的造势任势、“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兵不厌诈、“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的集中兵力，等等。可以说，这些名言粹语蕴含着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不断地启迪着人们去创造斗争智慧，至今仍为现代军事家们所珍视。

指挥方法。中国古代兵家对侦察、判断、决策、计划、实施等每一个作战指挥环节都有精彩论述。如“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的料敌察机，“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的情况判定，“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的果敢坚定，“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的周密计划，“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的灵活用兵，等等。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些从战争实践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和方法要诀，对于现代作战指挥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建军经验

中国兵法蕴含着选将任将、军事训练、教育管理等建军治军之法，揭示了许多朴素的规律性认识，为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练兵备战水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慧和营养。

选将带兵。将帅任用和士兵统领关系着战争胜败、国家安危，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多有论将论兵的精辟论述。如《六韬》说“将者，国之辅”“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强调将帅的作用，明确指出选拔任命将领的标准条件；《吴子》讲“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文武双全，才是良将。又如《黄石公三略》指出“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将帅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才能战胜敌人，强调“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把纪律视为取得胜利的保证，军纪严明的军队才能有坚强的战斗力。可以说，这些统军领兵的经验、治军方略的思想，经过了战争的检验、时间的印证，今天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教戒为先。中国古代兵家历来都把军事训练作为提升战力的基本途径，看成最直接的作战准备。如《吴子》说“以治为胜”“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强调军队要靠严格治理取胜，把从严教育训练作为用兵的首要任务，提出“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必须用“礼”教育、用“义”激励，使将士懂得荣辱羞耻，砥砺官兵；《司马法》也讲“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士兵如果不事先训练，是不能进行作战的。又如《管子》指出“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怎么合适就怎么训练，怎么有利就怎么行动，强调“三令”“五教”“九章”练兵之法。总之，未来战争是残酷的、硬碰硬的，这些治军训练的经验做法，经历了岁月磨洗，穿越了历史时空，对于我们今天练兵备战仍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观点争鸣

指挥决策不妨多些『反直觉』

■张西成

在对抗激烈、险情频发的战场上，指挥员作决策判断时，往往依赖大脑的直观感受、本能反应。尽管这种直觉判断契合了瞬息万变的战场实际，但也容易误入各种险境，因而重视反直觉思维非常重要。

什么叫反直觉，顾名思义就是对直觉及灵感这一“闪思维”的反向思考，蕴含有“越感觉不可能越有无限可能、越感觉很保险越容易出危险”的辩证反思之意，是打破传统经验及认知的一种另类思维方式。运用反直觉思维，可以让人跳出自以为是的泥潭，摆脱主观臆断的偏差，抛却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大脑的判断始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灵活的反应力，从而在人们忽视或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中，发现潜在的可行性因素，在难以预料的时间和空间里，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心理学家谢恩·弗雷德里克曾做过一个实验，让两个大学的学生解答同一个问题：1个球拍加1个球共计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球是多少钱？第一个大学50%、第二个大学56%的学生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球拍1美元，球0.10美元。而实际情况是球拍1.05美元，球0.05美元。被测试者为什么会出错？盖因他们只从认知惯性出发，仅凭直觉作答。可见，靠直觉行事虽然简单快捷，但不够准确。犯直觉性错误，不是少数人的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打开战争史册，不难发现这样的战例：营门大开，旌旗招展，以为必定有诈，不敢贸然冲杀，结果中了缓兵之计；放着大路不走，以为必定有埋伏，结果绕来绕去，反倒钻进了对方伏击圈；敌人开始火力急袭，以为接踵而来的必定是正面进攻，想不到背后突然响起了杀声；一列长长的坦克部队大摇大摆地穿过防区，以为是“自家人”无疑，想不到竟是“借路”的敌人。此类诸多“想不到”，并非由于疏忽所致，而是直觉偏差使然。某种程度上讲，对手正是预判并利用“你以为”的思维偏执、直觉偏差，反直觉而行之，才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一位哲人说过：如果你想对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请不要相信直觉。这话未免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因为直觉作为一种针对情况突然变化的本能反应，并没有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分析之上，并没有全面深刻地看到事物的底层逻辑，所以人们很容易被直觉误导、被表象蒙蔽。尤其是现代战场，敌对双方无不极尽隐真示假、施计用谋之能事，指挥员面对的信息往往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不确定性。此时，若仅凭直觉作决断，就难免会被对手算计——你以为敌人必定会这样，他偏偏会那样；你以为侥幸捡了个大便宜，到头来却栽了个大跟头。

数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统计二战中轰炸机的损失时指出，与人们的直觉判断相反，轰炸机身上中弹最少的部位，其实是最致命的部位。作为指挥员，当然需要足够的战场灵感和战场直觉，但更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对“自我感觉良好”的警醒，时刻提醒自己只要时间允许，务应多些检视和反思：我的直觉判断万一不准怎么办？会不会节外生枝？凡事都要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既想“一万”、也想“万一”，既有“绝招”、也有“备招”，确保一旦处于危局险局，能够迅即扭转局势。

看Sora如何赋能作战指挥

■唐林彬 陈 希 董 伟

挑灯看剑

近期，OpenAI公司推出视频生成模型Sora，可根据文本指令自动生成真实度极高的视频内容，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再次取得重大突破。这种技术一旦用于作战指挥领域，或将出现颠覆性变革。

指挥语言由图文抽象向视频具象转变。Sora的最大突破是理解人类语言并自动生成视频，不仅能够将复杂抽象的语言描述、非语言的情感色彩映射为直观的动态视频，还能将生涩难懂的地理概念转化为立体生动的三维演示，而且呈现的内容要素基本符合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基于此，Sora对作战文书、指挥口令、条令法规以及指挥员经验偏好、语言习惯、价值倾向进行强化训练和深度学习后，或可在符合指挥员意图的前提下，将图文格式的作战构想、行动方案、指挥命令转化成视频形式的交战场景、部队行动。不同指挥人员可根据交战场景视频，精准理解彼此思维活动，作战人员可根据部队行动视频，精准调控作战活动，最大限度避免因指挥语言表述或理解偏差而导致的决策共识难等问题。

指挥沟通由媒介交互向意识交流转变。Sora是模仿人类大脑工作原理的机器学习模型，目前已初具“近似人类”的自我认知、情感体验、思维推理能力，能够“听”懂人类语言、“理解”人的情绪和意图，并能较为逼真地呈现出来。基于此，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Sora或可成为连接人脑与人脑、人脑与机脑的“虚拟人”，实现意识层面的直接交流，不同指挥人员之间、指挥人员与机脑之间无需借助作战文书、指挥口令等媒介，就可进行作战知识、经验、意图等思维共享，既有利于将指挥员作战意图精准贯彻到作战筹划全过程，也有利于发挥“人脑+外脑”深度耦合、“定性+定量”优势互补、“艺术+科学”相辅相成的人机交互决策优势。加之武器数智化与网络化发展，或可实现人、“虚拟人”、武器在智力层面的相互铰链，整个作战体系将成为智能复合体，推动指挥员意图直接转化为部队行动。

指挥驱动由基于状态向基于趋势转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预训练，自主寻找和掌握规律，并能运用规律关联补充碎片化信息、盖然预判事物发展趋势。据悉，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全新模型的Sora既能修补缺损视频，也能将静止图片转化成完整的场景视频，具有创设情境的能力，堪称“物理世界模拟器”。基于此，类似Sora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对作战对手的战法理论、作战条令、武器装备以及战例场景等数据进行学习后，或可掌握对手作战规律，进而基于当前战场状态预测对方指挥员下步决策、预判对方部队行动趋势。作战指挥流程将由现在的“观察—调整—决策—行动”转变为“预判—决策—行动”，指挥活动将由被动处置、后发应对变为主动设计、先发制人，以驱散指挥不确定性带来的战场“迷雾”。

以突然性助推“以劣胜优”

■陈勇根

群策集

孙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克劳塞维茨也说：“突然性是一切战略战术的精髓。”力求达成突然性是古今中外一切作战行动遵循的基本准则。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出其不意地在短时间内给敌人物质和精神上带来沉重打击，是达成以劣胜优的重要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嬗变，达成作战突然性的方略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应该更加注重突破常规、创新运用，利用多种手段攻其不备，放大突然性作战效能，更好地实现以劣胜优。

通过隐蔽企图形成时间差达成突然性。目前，凭借先进侦察技术，已经实现了全维全谱侦察，战场透明化程度越来越高，时间窗口大幅缩短。针对这种情况，要善于通过隐蔽企图，达成突然性。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现代伪装技术，施以巧妙的战术谋略，制造战争“迷雾”，蔽敌双眼、迷其心智。这样即使敌人看到“山那边的事情”，也未必能及时看懂真实的意图，从而通过多维分布、网链式作战配置、快速聚合力量，形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场态势，于敌未知、趁敌未觉，或乘敌陷入“认知窘境”“决策死循环”时，先敌出手，攻敌于有效准备之前，达成作战突然性；另一方面，要广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依托网络化战场感知体系，在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中，快速捕捉敌出现思想松懈未防备、部署失当防守空虚、信火脱节、链路被断、行动失调、孤立突出、环境不利等“缝隙”，压缩指挥决策周期，先敌判断、先敌决策、先敌行动，实时聚优、快速反应，实现先机制敌。

通过运用新域新质力量达成突然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迅速发展，太空、极地、深海、网络等新域新质力量发展步伐加快、效益日益显现，新兴领域主导权争夺空前激烈。“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只有顺应时代，运用新技术、抢占新领域，才能实现弯道超车制胜敌人。颠覆性技术研发的新质装备是站在技术高位，针对对手作战体系薄弱环节，着眼超越敌现有装备，实施矛盾相克的专项碾压，具有“降维打击”的优势，极易产生技术突袭效果，在对方毫无察觉和无法防备的情况下，能有效破击敌体系的关键节点目标，造成其整体作战功能失调或瘫痪。如高超声速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电磁脉冲武器等新型武器已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不对称优势，是达成战场突然性的利器。

通过创新战法手段出奇招达成突然性。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曾说过：“在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争手段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正如孙子所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作为超常方法，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坚持创新战法、灵活用兵，用敌想不到、看不懂、摸不透的方法手段，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进而达成作战突然性。一方面，应善取他山之石，不断推陈出新，使传统战法谋略焕发生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以色列情报机构毫无预警，损失惨重。哈马斯突袭得手，主要得益于其“瞒天过海、集中兵力、地道战、游击战”等传统战法的创新运用。如“集中兵力”战法，由兵力集中变为瞬间饱和的火力集中，他们在首轮打击中，使用各式火箭弹、迫击炮和无人机攻击，在20分钟内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5000枚炮弹，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掌握高新技术发展方向，先敌一步拿出敌人未知的实用性战法，做到“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从而增强作战的不确定性和突然性。

通过多域混合战即时聚优达成突然性。“善集大成者，赢。”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之间的界限日益混合，战场上各作战域的边界日益模糊，诸军兵种间融合性、互补性、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面对多域作战能力融为一体的优势之敌，凭单一作战域、单一军种、单一作战手段达成作战突然性难度越来越大且作用有限。实施多域混合战，通过各种非正规作战手段运用、各个单域的“形散神聚”部署，不仅可以使作战准备悄无声息，还能瞬间实现多领域“攥指成拳”，让敌作战体系快速崩塌。为此，一方面，要注重发挥网聚功能，将各分散的作战单域的“链路”联结成“网络”状，实时依战场态势，敏捷响应、敏捷机动、敏捷聚合，实现各单域各层级在力量、手段、行动等方面的高度融合、体系联动、即时聚优、击要瘫体，实现局部优势互补、强点聚焦，以快吃慢达成以劣胜优；另一方面，要注重把秘密军事行动与战略威慑、经济活动、舆论斗争等非传统手段融为一体，通过缩小战场时空“禁区”，设置层层“迷雾”，灵巧运用“组合拳”，以己方综合优势攻击敌人软肋，从而抢占先机，达成更高层次的突然性。